

23118

# 营山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政协营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印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23118

# 目 录

|                       |                |
|-----------------------|----------------|
| 党的挚友郑奠欧.....          | 刘星耀 ( 1 )      |
| 与王永平同志一起下乡.....       | 马仁锐 ( 4 )      |
| 解放初期营山群众文化教育工作拾遗..... | 王定华 ( 7 )      |
| 营山“8·30”砒霜中毒事件.....   | 吴孟秋 ( 17 )     |
| 杨森驻防营山的几件事.....       | 杨春薇 ( 30 )     |
| 唐绍虞的教学生涯.....         | 王济民 袁孝培 ( 35 ) |
| 柳坝子事件与围剿樊鹏.....       | 刘致中 ( 40 )     |
| 肖应南除匪.....            | 王泽民 廖恒夫 ( 43 ) |
| 龙纪官之死.....            | 彭俊雄 ( 46 )     |
| 营山县农业技术学校的兴起与发展.....  | 王玖琳 曹季侯 ( 48 ) |
| 解放前营山几笔水利拨款的背后.....   | 蹇西北 袁孝培 ( 52 ) |
| 深刻的教训.....            | 彭寿烈 ( 56 )     |
| 营山丝烟业.....            | 何泽春 ( 59 )     |
| 乡村货郎.....             | 张映斗 ( 63 )     |
| 营山的西药与基督教.....        | 郭受祺 ( 67 )     |
| 解放前营山县城中药业简况.....     | 何才庚 ( 72 )     |
| 天池出土的清代货币.....        | 刘 敏 ( 77 )     |

## 党的挚友郑奠欧

刘 星 耀

郑奠欧，又名郑国平，营山县市乡人，生于1897年。少时就读于本地私塾、营山县高校、南充联合中学。1919年4月去武昌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准备留学法国。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先后在武昌、北京与工农群众学生一道参加革命活动，同赵世炎等创办《工读报》，反帝反军阀，提倡科学与民主。1919年与营山同学杨伯凯、石琮、柏载鵬等赴法国勤工俭学。两年后，在王若飞的提议下又去比利时留学。郑奠欧在留学期间，努力学习电机专业，与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关系密切。在巴黎参与党领导留学生进行的革命活动。1926年郑奠欧完成学业，离开巴黎回国，在重庆开办大同公司，经营电气产品。时与在重庆投入大革命洪流的同学、共产党员杨伯凯、柏载鵬、杨如松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资助经费、传递信件，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的斗争。1927年3月，重庆军阀王陵基，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郑奠欧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帮助杨伯凯、任白戈等十多位共产党员转移脱险，协助党组织安抚被害同志的家属。在特务、军警大清查中，郑奠欧受到审问株连，大同公司遭到查封、被罚大洋1000元。1939年秋，留法同学、共产党员何以端回到重庆，周恩来同志交给何以端负责策动重庆国民党军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何以端在重庆找到郑奠欧，受到郑无微不至的关

照。何以端以采矿工程师身份出现在重庆工商界，郑奠欧为他举行宴会，请来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以扩大何的影响。不久，何以端被聘为北碚三才生煤矿总工程师。抗战期间，重庆的间谍、特务无处不在。一天，两个陌生人找到郑奠欧“了解”何以端，说他不是工程师。郑奠欧见这样的陌生人很多，便装着爱理不理地说大话：“他不是工程师，那重庆日日夜夜烧天府煤矿的煤就成问题了！”郑奠欧为党作的奉献，有些是无人所知的。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内战爆发，何以端调南京办事处，在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负责对敌军界的策反工作。郑奠欧听从何以端的安排，随即携带妻子儿女移居上海，在霞飞路开了大同公司仍经营电器产品。何以端在京、沪、杭敌战区的工作卓著，受到中央表彰，其中有郑奠欧一分功劳。这期间他的家成为何以端工作极隐蔽的联络点，消息最灵通的哨所。为了何以端的安全，郑精心给他准备了多种服装：有时是西装革履，像是一位学者；有时长衣大褂，头戴博士帽，像一位官商；有时又是一身工农的装束，使他平安地应付了各种场面。1949年春，华东野战军敌工部部长陈同生（营山同乡）派人求购医药，郑冒着风险为之四处采购，寻找汽车，护送到苏北解放区，解决了苏北医药奇缺的严重困难。这位党外同志的真诚奉献，至今苏北人民没有忘记。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上海解放，郑奠欧与上海人民一道兴高采烈庆祝胜利，他态度严肃、心情激动地对着妻子毛以蓉说：“我们脚下的艰险已走过了，我们的‘生意’该收场了，我们到政府机关工作去！”说完这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联络部长的陈同生、任联络

局长的何以端来霞飞路扣他的门，要他继续开办大同公司，资金不够由国家出，配合国家安全部，开展反间谍反特务活动，打击暗藏的反动势力。郑莫欧又不顾风险接受了这一任务，把大同公司开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送往迎来各类顾客，面目不阴不阳，为我国安全部门获得了大量谍报，为保卫刚解放的上海的安全尽了责任。陈毅同志与郑莫欧是留法同学，知道他为党甘当无名英雄亦很敬佩。

1954年，郑莫欧结束了上海大同公司老板的生涯，到国家外贸部任技术专员。1959年调任黑龙江省机械局任副局长，被选为省人民代表。1965年他回北京养病，1975年10月患脑溢血逝世，终年78岁，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 与王永平同志一起下乡

马仁锐

1970年10月到1984年1月初，我都在王永平同志身边工作。他的思想政治品质、领导艺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那求实作风更让人难以忘怀。

1970年以后王永平先是任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后任县革委副主任，主管工农业生产。他知道我是学农业的，便要我同他一道从事农村工作。王永平同志为了掌握各区乡农村工作情况，他带着我在两年中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了全县十个区，六十九个乡镇，四百多个大队。一次从柏林出发，沿着合兴、悦中、六合、明德、柏垭、复兴、清源、会龙、灵鹭等边界乡，走了半个多月。一路上他不要区乡干部陪同，踏着山间小路，沿途调查了解农村生产、社员生活情况。面对“文化大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次在黑马山上一户社员家歇脚，主人听我介绍后十分热情，吃饭时他端了一小木盆蒸红苕，一人一碗菜汤，还有一小碗嫩南瓜藤尖、南瓜花把子做的菜，不要说油，连盐也没有，是舀泡菜盐水拌的咸味，实在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晚上主人给我俩腾了一架床，蚊帐大眼小洞，被盖疤上重疤。夜已很深了，王永平仍然未睡着，我问他：“您还在想啥子，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哇。”他说：“今天看到的情况能让我睡得着吗？”王永平同志沿途查看民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对“莺歌燕舞”极为

反感，决心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去为老百姓多谋些福利。在经常的下乡中，他亲自询问、观察，指示我总结了大量经验典型材料，通过会议、文件在全县推广。1980年，王永平在双林乡了解到一个队暗中把土地承包到个人，获得粮食大增产后，他力排众议，充分肯定，加以支持，致使我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对确保营山农业连年丰收起了重要作用。

王永平同志下乡从不讲排场，不给基层同志增添麻烦。晚上不要干部为他让铺，有旅社就住旅社，吃饭有啥就吃啥，从不事先打招呼。当时乡场上不逢场就不杀猪，许多时候都是吃小菜或咸菜下饭，记得间或也有吃肉的机会，最丰盛的是一人一碗粉蒸肉或白萝卜肉片。吃了饭，他就叫我去结床铺钱和伙食费，一角一分斗硬付清，有时他还问我给了钱没有，要我拿发票给他看。王永平同志从不占公家便宜，有时晚上开了会，哪位乡干部在自己的箱箱里捧出点花生、核桃，他就拿出钱叫我去买酒打平伙。我不喝酒，他常当众开玩笑说：“马仁锐今天又吃亏了。”

王永平同志联系群众，生活简朴，而且作风民主，与人平等相待。1975年后，尽管他已担任营山县委书记，但民主作风一点未变。我经常代他起草讲话稿，他过目后常提出一些新的意见，有时把我的想法提出来，他认为有道理，便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他相信同志，可以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下属即或未把事情办妥当，也不呵斥别人，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好几次我替他起草的材料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他很快就转告我，还要鼓励一番。间或还买上点小礼品，如钢笔之类相送，使人感到温暖。年头岁节或下乡回来

晚了，他还把我请到家中吃饭，摆家常，十分亲切。我跟他下乡，有时长达十多天，路上从不感到寂寞，他一路走一路摆这摆那，上自国家大事，下自生活小节，连他青少年时期在农村挑柴卖、织土布、赶早场害怕等等，无所不谈，让我感觉不到有胆小、怕得罪他这些顾虑。他有时也发脾气，借批评过人，但当他意识到后，会主动找你谈心作自我批评，从不以书记自居，对其他领导，他十分尊重，讨论决定问题只以一票表明态度，从不以书记身份行使否决权。所以在他身边工作感到高兴愉快。

王永平同志去世了，他那平易近人、团结同志、重调查、讲民主的作风确让人铭记在心。



# 解放初期营山群众文化教育工作拾遗

王定华

营山解放初期的几年中，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为了紧密配合各项中心任务，加强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全县出现过许多空前盛况。略书数事，以补缺遗。

## 春节宣传

1950年冬，川北区文联（筹）召开了全区戏剧音乐座谈会，并号召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春节宣传活动。会议后，中共营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县第一届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贯彻川北区会议精神，确定各地组织中、小学教师为基本力量，配合农民协会，广泛发动群众和民间艺人，团结社会热心人士，自1951年正月初一到初五，运用各种形式，全面深入地进行一次春节文艺宣传演唱活动。为了配合这一活动，春节前夕，《川北日报》、《川北大众》等报刊还连续发表了许多民间形式的说唱及戏剧材料，供各地采用。

广大贫苦农民在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后，他们积极投身活动，好些人不仅是观众，而且是演员。许多地方演出了以减租、退押中真人真事为题材，自编自演的动人节目。如回龙乡演出的喜剧《皆大欢喜》就表现了农民分得减租、退押胜利果实后的喜悦。张家乡（今绿水）、小

桥镇、骆市乡的农民业余剧团也应运而生，他们既演现代戏，也演旧川戏。张家乡业余剧团还带戏下乡，活动在村组，配合中心工作宣传，成绩显著。该团负责人廖家泽后来被推荐出席了“川北区文代会”。城附乡农民协会文中良写的车灯唱词《月月乐》利用旧形式表现了解放后一年十二个月的农村新气象，此唱词后在《川北日报》上发表，还得了当年川北区文艺创作二等奖。西桥乡的鲜奇荣在街头即兴自编自演了许多快板唱段，更有明德乡肖仕文父子的翻山铰子，大庙乡王彬成的肉金钱板，到处引起轰动。此外，观音乡（今星火）学校的教师一放寒假就排好了《王大娘补缸》、《一袋米》、《夫妻识字》、《一朵红花》多出节目，晚间在场镇演，白天巡回下村，还将节目送去毗邻的西桥乡演出……那几天，无论平坝山区、城镇乡村，到处敲锣打鼓，股股人流随着龙灯、狮灯、腰鼓、高跷，来来往往。老师还率领在校学生扭起秧歌舞，高唱革命歌，无论走到哪里，处处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整个城乡都洋溢着庆解放、庆新生，欢乐喜悦的激情。

1951年4月，营山县文联筹委会成立。8月《川北日报》发表了胡耀邦主任的《表现新英雄、新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县文联即利用全县暑期教师学习会组织了学习，并请正在新店区参加土改的川北区文联副秘书长白航（今《星星诗刊》编委）作了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讲话；县文联也总结了春节宣传工作，并以校为基础，建立了各乡（镇）的文艺小组，把各地文艺活动纳入了组织轨道，理顺了领导关系，使此后1952年、1953年的春节宣传更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在这后两年的活动中，各地都出现了演大戏的倾向。营

中先后演了《王秀鸾》、《秦洛正》，骆市业余剧团演了《丁佑君》，小桥也演了《王贵与李香香》，老林演了《小二黑结婚》，安固完小的教师也演了《阿妮妮》……这段时间县城各街段都成立起了文艺宣传队，他们聚集寒假回家的中、小学生和街段青年，演出《采茶扑蝶》、《荷花灯》、《十大姐》、《庆丰收》等多出歌舞节目，显得分外活泼清新，很受群众欢迎。到了1953年县上为贯彻政务院指示，纠正中、小学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的忙乱现象，1954年学校参加春节宣传活动就停止了。此后一般文艺活动也转入了经常化。

### 扫盲夜校

营山的农民识字教育开始于1950年减租、退押期中。最初，工作组下乡时，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协会在当地学校的配合下，常组织贫雇农民既开会学习，又唱歌跳舞的临时集会。地点在农会所在地或村小学，时间多为晚间。参加的人员除少数老年贫雇农外，更多的是中、青年农民积极分子，有男有女，特别是那些长期深锁在家庭中的妇女，一旦接触外界事物，接受阶级教育，觉悟提高很快，迫切需要文化武装自己。这年冬天，县府向县文化馆和城乡各级学校下达了抓住时机，大力动员，在全县开展冬季扫盲工作的指示。

首先城镇各段在文化馆的领导下都先后办起了常年识字班，而且越办越兴旺；县党政机关还办了勤杂人员及家属的文化夜校；各区乡的中、小学也有一至二个常年识字班；至于农村，季节性的夜校更象雨后春笋，每个行

政村至少有二至三处。土改中夜校发展更加迅速，每到黄昏，无论走到何处，都是一片读书声、唱歌声，特别是深夜散学，田坎上灯笼火把宛如游龙。中央土改参观团及川北区党委派来营山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见到都惊叹营山扫盲声势浩大，成绩显著，赞誉为：“村村夜校灯火明，家家传出读书声。”1952年统计全县办冬学（即扫盲夜校）1078所，入学人数35581人。

办学中，县文化馆和各中、小学都派了专人负责。教师多为城镇及农村闲散知识分子，各校成绩较好的在校高年级学生，有的经过培养也当起了“小先生”。这些人都不计任何报酬，尤其是“小先生”，放学后急忙赶到家，晚上在本村夜校既教识字，又教唱歌，还兼当读报员。办学的用具或借当地学校的黑板桌凳，或从学员自己家里搬来，一切因陋就简。开支经费大多是学员自筹，或由乡、村补助，1952年后县文教科才给各乡拨了少许经费，补助灯油开支。教材最初是自编课本，由中、小学教师负责，还在各农户门窗农具上写上汉字，如“门”、“窗”、“犁头”、“拌桶”等，便于学后借助实物形象，以利巩固。1952年才统一采用省编《农民识字课本》。学习中，学员互教互学，教师和学员订包教保学合同，儿女教父母，丈夫教妻子，婆媳比进度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双河街村（今双流镇）70高龄的老大娘章曾修天天带上媳妇、女儿上夜校，一时传为佳话。

1952年4月和8月县文教科先后派人参加了行署教育厅和专署文教科举办的两次“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基干教员训教班。10月县里抽调了在职和夜校教师培训了速成识字基干教员120余人，随即成立了“营山工农速成识字扫盲委员

会”，在文化馆设立了办公室，并在经过培训的在职教师中选调了4名任专职干部。

速成识字需要学员抛弃一切杂念，思维高度集中，借助注音符号的帮助，大量突击认识汉字，先占有而后根据成年人的生活特点，在运用中逐渐巩固。办公室为了取得经验，确定先在城附新生社和小桥镇以农村干部为对象，各办一个重点班。可是城附的班刚开学不久，就因必须给当时全县小社转大社的中心工作让路，突击认识注音还未进行完就停办了。而小桥的班，由于区委重视，又无中心工作冲突，一直坚持到第二年春天开始农忙。这一班的学员此后在工作中大都能够阅读文件，记录简单笔记，基本扫除了文盲。

此后，由于农村形势的变化，夜校师资条件也不够稳定，扫盲办公室对不能继续巩固的夜校进行了整顿，只保留了些中、小学直接领导的常年夜校。1954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农村行政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扫盲工作也陆续停止。1955年“扫盲委员会”更名为“苍山县工农教育委员会”。

### 传声广播

解放初期，新闻传播媒介非常缺乏，邮件投递也很迟缓，当时的报纸，只能靠步行传送。去区乡，最快的也要三天。县内自征粮以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等一系列中心工作不断开展，如何满足群众需要，及时传递本县及国内外更多更新的消息，是摆在文化宣传部门的首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县内没有新闻出版刊物，也无收音设备，只有文化馆在馆门外办了两张黑板报，登了些本县消息和过时新闻，每到早晨八点，板报还未写

完，就站满了围观的群众。1951年上半年，地委给营山派来了在西南学习无线电收音的杨伯懿同志，他只带回一部5灯管直流收音机，暂时在文化馆建立了收音室，但当时营山连照明用电都没有，也别无任何器材，无法将新闻消息扩送出去，只好每晚深夜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记录好，复写三份，县委、县府各送一份，文化馆自留一份，作为第二天黑板报“收音新闻”专栏内容。从此，营山县城算是能够及时知道国内外最新消息了。

为了把收音新闻和县内消息更广泛更及时地传播出去，文化馆先是用白铁做的扬声筒在钟楼上喊话向外传播，但这种方式效果不好，稍远即瓮声瓮气听不清楚。后来经过馆内研讨，将扬声筒管道伸长，出口处呈喇叭口，总体约长二公尺，很象一支长号，腰际可以悬挂在钟楼上，喊话时便于掌握着向四方转动，虽远在营中，也可以听到播音。同时又在距县城周围五华里内的村组建立广播网点，一方面天天编好广播新闻稿，油印数十张供网点取用；一方面每个网点选送一、二人到馆学习唱新歌和喊话技能。这些参加学习的广播员，都是刚从学校回乡的初中或高小学生，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不仅每晚按时广播，而且还主动天天到文化馆领取新闻稿。

每天夜黑8点以后广播开始时，情景是十分感人的。文化馆钟楼上先拉响解放时接管的一只手摇警报器，那“噙……噙……”长啸顿时声闻四乡，然后由先组织好的“大家唱”合唱组的男女学生四人在上面唱歌，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引起城乡群众注意和传达给附近网点的播音员，预示广播就要开始了。然后钟楼上才正式按新闻稿开始播音，播出的声音洪亮，节奏慢而吐字清晰，先后将新闻向四方各喊一遍，这

会”，在文化馆设立了办公室，并在经过培训的在职教师中选调了4名任专职干部。

速成识字需要学员抛弃一切杂念，思维高度集中，借助注音符号的帮助，大量突击认识汉字，先占有而后根据成年人的生活特点，在运用中逐渐巩固。办公室为了取得经验，确定先在城附新生社和小桥镇以农村干部为对象，各办一个重点班。可是城附的班刚开学不久，就因必须给当时全县小社转大社的中心工作让路，突击认识注音还未进行完就停办了。而小桥的班，由于区委重视，又无中心工作冲突，一直坚持到第二年春天开始农忙。这一班的学员此后在工作中大都能够阅读文件，记录简单笔记，基本扫除了文盲。

此后，由于农村形势的变化，夜校师资条件也不够稳定，扫盲办公室对不能继续巩固的夜校进行了整顿，只保留了些中、小学直接领导的常年夜校。1954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农村行政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扫盲工作也陆续停止。1955年“扫盲委员会”更名为“莒山县工农教育委员会”。

### 传声广播

解放初期，新闻传播媒介非常缺乏，邮件投递也很迟缓，当时的报纸，只能靠步行传送。去区乡，最快的也要三天。县内自征粮以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捐献运动等一系列中心工作不断开展，如何满足群众需要，及时传递本县及国内外更多更新的消息，是摆在文化宣传部门的首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县内没有新闻出版刊物，也无收音设备，只有文化馆在馆门外办了两张黑板报，登了些本县消息和过时新闻，每到早晨八点，板报还未写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意见，缓解当时的矛盾，责成各区、乡政府和各级学校组织全县教师在暑假期中大力开展劳动教育，深入基层，对广大农民群众和城镇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讲明盼子女入学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必须以国家现状和前途为前提，体谅国家的困难，并用算帐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方法帮助家长和学生，正确解决自身需要和国家可能二者之间的矛盾。

工作开展时，县、区设立了办公室，晋中向各区派去了招生工作人员。一阶段：各区、乡小学将各级毕业生分类排队，摸清住地、家庭情况（主要是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高中生在全县分布比例不大，问题也不那么突出），每村配备教师1—2人，随身带上该村学生名单，下村包干负责。下去后在乡的领导下，配合中心工作，在村、组（社）会议上交代政策，讲清情况，说明当前国家的困难，招生数额只能按国家计划执行的原因。同时走访家长，和他们共同劳动谈心，做好每一学生家庭的具体思想工作。各区、乡学校从暑假开始，按上级统一的日程进度安排，开好各种会议。对毕业学生作“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升学或从事生产劳动）的教育；对家长作形势教育和说服工作；对阶级敌人则训诫其必须规矩守法，不准乱说乱动。同时天天向上一级办公室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向题，研究县、区下达的各地经验及纠偏指示，及时改进工作，纠正偏差。这一阶段主要进行宣传教育，在舆论上扩大社会声势，在认识上尽量打通家长、学生思想。二阶段：主要是送录取通知书。这时，初中、大专新生录取名单先后下达了。工作人员对录取了的，要指明前途，使其作好入学的一切准备；对落榜的要更进



一步对本人及家庭成员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保证少反复和不出问题。工作成熟了，才一户户送录取通知书。这一阶段学生、家长、教师的情绪都是很紧张的。学生怕落榜受家长责备，旁人耻笑。家长怕子女不被录取，丧失了深造机会和前途。教师怕工作不成熟炒了“夹生饭”，一户不通，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引起民众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责难，给落榜生带来压力。三阶段：主要是对落榜生的妥善安排：（一）教师走访落榜生，和家长共商其子女的就业安排，教育他们安心农业生产；（二）学校和农业社协商，尽可能将高、初中生安置在社内任会计或其它工作，小学生任记分员、读报员，使其学有所用；（三）在乡（镇）组织复习班自学，学校派教师指导；（四）鼓励中学落榜生及社会知识分子开办民办初小，接纳未入学的学龄儿童。

通过1954、1955连续两年的劳动教育工作，基本转变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缓解了对学校的压力。教师虽付出了许多心血，但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他们白天顶着烈日酷暑去农村捋谷抢收，夜晚披星戴月下村（社）开会，就是雨天也不愿延误了统一进度，冒雨前往。下去了要一家家做工作，回来了要一项项汇报，整整两个暑假从未休息。有的教师本身就是毕业生家长，还得首先自己通了，才能把别人工作做通。工作中大家都把劲往一处使，任劳任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好评。

自1954年经过劳动教育后，当年小学在校学生比1953年减少了1127人，1955年又比1954年减少了258人。二龙乡（今涌泉）完小1954年高小毕业班除几名自愿就业的学生外，全都考上了营中，校长朱治国不但未受到嘉奖，反而挨了批